

何为内亚？内亚史何为？

——由新近引进的几部内亚史专著说起

■ 常绍民

内亚史是近些年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所谓内亚视角，更是热门的话题。然而，到底何为内亚，国内学界的认识和界定仍较混乱。如何进行内亚史研究？内亚史研究对我们有何意义？新近引进出版的几部内亚史著作，有助于我们破解谜团，起到攻玉的作用。

把中亚和内亚严格区分开来并不容易

作为学术概念，“内亚”问世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比如拉铁摩尔在1940年出版的一部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此处“内陆亚洲”就是“内亚”，但这一术语在我国流传开来，是最迟二三十年的事。

更广泛为人使用的是“中亚”，此词一方面非常明确，如我们常说前苏联中亚五国，另一方面同样存在着混乱不清的状况。我国考古学者许宏在其新著《东亚青铜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中对“中亚”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它在科学文献中存在已久，具体地理界限则众说纷纭。“丝绸之路”术语的创始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中亚”包括亚洲内陆地带以没有外河注入外海的水文体系为特征的所有地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中亚文明史》，专门对“中亚”一词做了说明，强调“本研究中所谓的‘中亚’相当于亚洲大陆的全部内陆部分——我们将遵循此词的前一百年间所发展的有关中亚历史和研究的传统”，明确指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巴基斯坦以及苏联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不过，该书同时声明，“本书所用的‘中亚’一名，也可以视作‘内亚’的异名”。可见严格把中亚和内亚区分开来并非易事，许著本身在一些地方对中亚和内亚概念的区分也不那么严格。美国知名中亚史专家苏塞克·苏塞克在《内亚史》（袁剑、程秀金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同时使用“内亚”和“中亚”两词，但对两者进行了区分：“中亚”指内亚的西部。我国学者在使用中亚一词进行研究时，则往往把西人概念中内亚的部分排除在外，另行叙述。

那么，到底何为内亚？苏塞克认为，内亚是指在历史地理概念上欧亚核心地区的这一整片区域，按现代地理区划，主要包括七个国家和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中国西部部分区域。此外还有其他八个行政区，其中七个属于俄罗斯，包括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图瓦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另一个属于中国，是内蒙古自治区。

就大的方面讲，《内亚史》《剑桥早期内亚史》和《欧亚之门》（陈向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出版）对内亚有着基本类似的界定，就是中央欧亚。

《欧亚之门》全名《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著者为俄国学者柳·克里亚科娃与安·叶皮霍瓦，意在中央欧亚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进行深入介绍。

对内亚概念进行详细和明确诠释的是《剑桥早期内亚史》（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该书指出，欧亚大陆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实体，这片巨型大陆的外缘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定居文明，书中关心的则是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或者用一个不太冗长、但不太准确的地名称呼：内亚”。这部由多国知名学者合作撰写、以专题论文集形式而成的重量级著作，主编为美国内亚史权威、国际阿尔泰学会创始人之一丹尼斯·塞诺，即现已广为学术界接受并习用的“中央欧亚”概念的发明人。塞诺指出，书中所说的内亚，主要是“一个文化而不是地理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围绕着麦金德所说“历史的地理枢纽”相关的地区展开，涉及范围东起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西至东欧匈牙利大草原，北起北冰洋以南冰原、南到传统上几大文明区的广阔地区。塞诺之所以说内亚一词并不太准确（他更倾向于使用中央欧亚），是因为它的边界并不稳固，随时代而变化，“随内亚居民与周边居民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中国北部在契丹、女真、蒙古人和满族人占领期间暂时也成了内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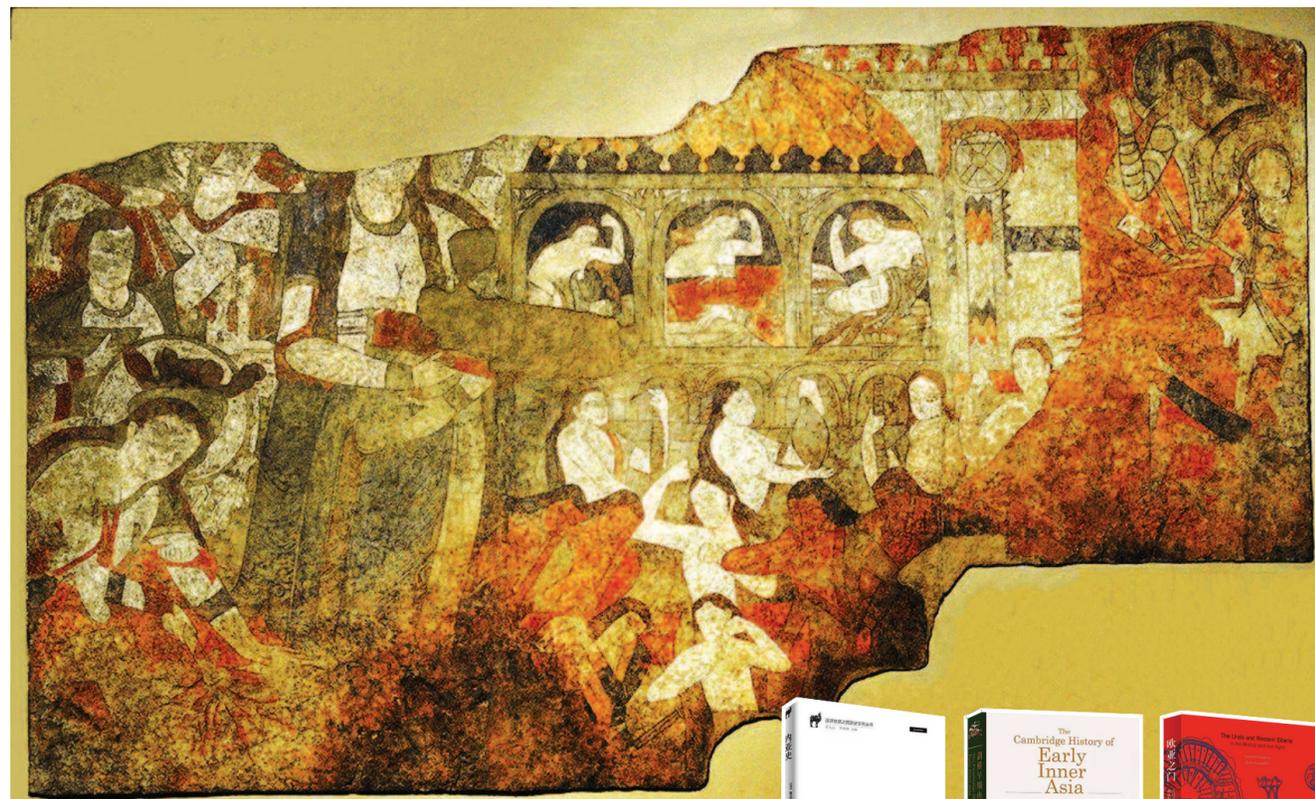
内亚周边诸文明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而内亚的核心生存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畜牧业，“缺乏充足的水源、生长季节短，加上与土壤相关的问题和难以应付的地形，这些都成为阻止定居农业发展的主要自然地理障碍”。除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外，其最典型的特征还有因地域辽阔造成的地理多样性和总体上地形、气候方面的一致性以及供水不足等。内亚总面积逾800万平方英里，从北向南大致可分为苔原、森林带、草原带、沙漠带等自然带，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无疑是草原地带，“大草原是理解内亚在世界史上作用的关键”。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是草原经济的支柱，也是生产的主要商品，国家财富的积累也依赖于马。“传统的内亚经济不是以获利为目标；其目标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获取因这种或那种原因在内亚不能生产的货物。为获取这些货物，必须求助于对外贸易，主要是与定居文明的贸易”。然而，贸易的另一面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内亚诸族与周边定居民族的冲突构成长达数千年的欧亚历史的重要特征。“公元前一千纪出现了一批后来长期占据人类历史舞台并且非常强大的新角色，他们的‘蛮族’形象总是与不断迁徙、破坏和恐怖联系在一起”（《欧亚之门》第239页）。这些所谓蛮族因常常扮演入侵者的角色而被周边农业民族视为另类，几乎垄断了历史书写的东西方文明世界中充满了这种偏见。

讲到内亚史，无疑绕不开中国

上面简单介绍了何为内亚。与此相连，研究内亚史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首先，内亚与我国关系密切。欧亚草原包括东起蒙古西至匈牙利潘诺尼亚草原这片非常广阔的地域。研究表明，蒙古高原是游牧文化的发源地，许多重要的草原帝国也与此多有关联，因而，讲到内亚，无疑离不开中国。自中华文明发育成形，自有文字产生、信史形成开始，中国文献中就充斥着有关北方戎狄等的记载，与北方包括西方民族的冲突互动构成中国历史的一大脉络。可以说，不了解内亚，尤其是游牧文化，就无法全面把握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文明。正因为如此，内亚史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也正因此如此，最近引进的这几部内亚史著作，都以相当篇幅讲到中国，实际上也绕不开中国。



▲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代遗址壁画，作于公元六世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剑桥早期内亚史》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叙述到十三世纪初蒙古征服前夕，重点是公元前一千纪以降。这部书的主旨，用塞诺的话来说，“不是一部蒙古统治以前的标准历史，而是一部我们所知的、这一阶段学术的忠实陈述。我们试图忽略那些没有揭示主要事件的细节，专注于更重要的、即对未来发展产生结果的那些事实”。与中国相关的北方各民族及其文化是本书的重点，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与中国相关部分的作者，除主编塞诺（第11章《突厥帝国的建立与瓦解》），还有澳大利亚学者柯林·麦克勒斯（第12章《回鹘》）、美国学者赫穆特·霍夫曼（第14章《早期和中世纪的西藏》）和德国汉学家傅海波（第15章《满洲的森林民族》）等，阵容可谓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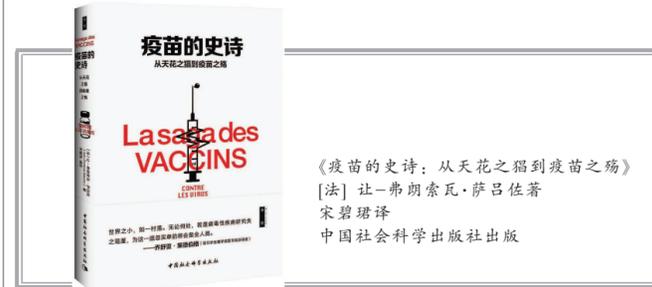
两位俄国学者合著的《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可与《剑桥早期内亚史》形成重要互补。该书以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为中心，涉及从乌拉尔山脉往东直到西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坦北部广大区域，重点介绍了苏联/俄罗斯考古学者的考古发现，研究和分析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央欧亚地区的物质遗存，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前一千年。乌拉尔地区在地理学上被定义为欧洲和亚洲的天然分界线，以广阔多样的地貌和环境——草原、森林-草原、森林和山地著称。在这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十字路口，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众多文化在此相遇。无论起源于欧洲还是亚洲，它们互动的结果都使这里产生了更丰富的文化传统。书中认为，中央欧亚地区的铁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具有质的不同。青铜时代主要是以移动迁徙为主的草原畜牧业，铁器时代主要是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文化。欧亚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社会是在欧亚东部的蒙古草原上诞生的，然后从东向西传播。这种游牧社会不仅要求在技术层面控制牛群，还要求驯化马、羊和双峰骆驼。这些早期的游牧社会以及后来的第一批草原帝国之所以能产生，原因之一是他们已从事跨地区的交流和交换，其中也包括与南部定居国家和社会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中国到罗马，也包括中亚以南的国家如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等）。这样一部非常专业的考古学专著，因此与西至东欧、东到中国、南到近东的欧亚世界有了密切联系，中国自然也是其叙述中的重要一环。评论者认为，该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内关于中央欧亚地区史前史研究的基本参考著作。要了解我国历史文化形成的过程，正确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该书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丝绸之路研究离不开对内亚的了解

研究中亚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有助于认识我国当前的现实，找到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参考借鉴。

历史地瞭望疫苗的未来

■ 邹贻韬



《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祸到疫苗之殇》[法]让-弗朗索瓦·萨吕佐著 宋碧琪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疫苗是已知最大限度的抗病原微生物工具。医史学者普遍认为，确切可考的疫苗雏形至少可远追至公元四世纪的痘苗，而1796年爱德华·詹纳完成现代意义上首次疫苗接种，迄今也已过去两个多世纪。200多年来，近现代疫苗开花散叶，长成葱茏疫苗“家族树”，覆盖从多型流感到乳头瘤病毒（HPV）的方方面面，保护着由新生儿至易感老人之世世代代，

更加速了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推动着健康寿命内生存质量之优化，有功于而今这个远较往昔喧嚣皇上的文明世界。

我们真的了解疫苗吗？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法国病毒学家让-弗朗索瓦·萨吕佐的《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祸到疫苗之殇》（简称“《史诗》”）初版十年后，遭遇了疫苗一夜突起的“新冠时代”，令该书重焕新意。

通览《史诗》，其中有两贯穿疫苗过往始终的线索：其一，疫苗是“历史的”疫苗，它并非一步登天的“神器”，而是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涉滩越岭艰难求索的阶段产物；其二，疫苗的发展与推广时刻面对内部“非均质”难题，充分考验着人类社会平衡能力，甚至平衡能力高低决定着疫苗是否可以帮助人类逃出生天。

对于疫苗“历史的”本质，萨吕佐有两处洞见堪称振聋发聩。首先，疫苗是不确定性的产物，并时刻为不确定性缠身，“完美疫苗”仅是有违客观条件的主观臆测。《史诗》介绍，1939至1956年间，约有5600万人次接种的、为抗击黄热病大流行立下汗马功劳的FNV疫苗（撒哈拉以南非洲曾强制接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被查出有致儿童病毒性脑炎的风险。受此影响，FNV疫苗最终黯然退场。“二战”期间，在30多万被黄热病疫苗所保护的美军里，有62人死于或与疫苗有关的急性肝炎。经过科学家通盘盘点，罪魁祸首竟然是“当时能实现之最佳条件”加工下捐献血浆内残存的乙肝病毒。化用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人类所见、所用乃至所能想象的“好疫苗”，均是现行知识世界与科技实践的产物，“一代有一代之疫苗”。这呼唤疫苗研发不断查漏补缺，也提醒我们应宏观评价疫苗，不可轻易倒置地因个例而仓促否定，要对疫苗抱有适度容错心。

其次，望穿可预见的科技蓝图，不论技术如何迭代，更好疫苗的研发将长期或永久是一项系统创新工程。这意味着疫苗创新绝非在现成“程序”里修改“代码”，而是集诸学科前沿的、不断于“先进-落伍-再先进”螺旋上升里创造性破坏的科学活动。新冠疫情暴发后，较前瞻的RNA疫苗曾在“疫苗赛跑”中一骑绝尘。但很快科学家发觉，除“无需携带任何感染因子”等已知优势外，RNA疫苗尚因“多剂方能免疫、需要超低温冷链贮存”等短板而颇显短浅。鉴于此，疫苗系统性创新的意义，可谓炳如观火。

《史诗》揭示了疫苗生产与使用的国际“非均质”——疫苗消费大国与生产大国一旦“脱钩”，后果不堪设想。2004年，美国流感疫苗短缺，价浮十倍后尚出现8000名65岁以上老人争抢一支疫苗的奇景。联想近期印

度新冠疫情急剧恶化后严控疫苗出口，导致本在全球疫苗供应链占据重要位置的印度疫苗“闪退”，世卫组织所言发达/发展中国家疫苗分配“令人震惊的失衡”更甚严峻。那么人类能怎样把握疫苗生产与使用的国际平衡？作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世界的疫苗（免疫）观”破除疫苗民族主义壁垒，建立稳定可靠的新型全球疫苗生产、分配管理体系。

《史诗》既是病毒学家为疫苗所写的“正传”，也是新冠全球大流行期间人类“自省”的历史参照。《史诗》回望了现代疫苗陪伴人类的200余年，更启迪我们在书写疫苗新史诗时践行理性且平衡的善治。有鉴于此，《史诗》历史地瞭望了疫苗的未来。（作者系国际医史学会会员）

（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